

“哲学观的反思与重构”丛书

主编 李景源



价值论转向

——现代

路

孙伟平 著

J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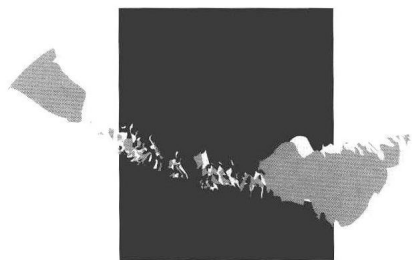
ZHǖANXIANG
XIANDAI ZHEXUE DE
KUNJING YU CHULU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哲学观的反思与重构”丛书

“哲学观的反思与重构”丛书

主编 李景源



价值论转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价值论转向: 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孙伟平著.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81141 - 140 - 9

I. ①价… II. ①孙… III. ①价值论 (哲学) —研究 IV. ①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7266 号

价值论转向
——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孙伟平 著

出 版 人: 张传开

责任编辑: 木 子

装帧设计: 王 芳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 241002

发 行 部: 0553 - 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lbsfx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芜湖新欣传媒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修订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965 × 1270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52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41 - 140 - 9

定 价: 28.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树立“中国特色”研究范式，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

——代序言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贯通这三个概念的基本内核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的“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根本指向，也是我们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

一、提出“中国特色”研究范式的意义

“中国特色”概念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有各种表述形式，最常用的经典表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互趋近是科学的理论和合理的实践的固有要求，它既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也应是其他理论和学问演进的内在原则。就哲学来说，一个世纪前，当哲学作为学科建制在中国出现以来，就提出了如何对待外国哲学、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毛泽东）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先后提出了“中国的”与“在中国的”研究

范式的区分。冯友兰曾以金岳霖为例指出，金岳霖的《论道》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哲学”，而他的《知识论》和《逻辑》则是“在中国的哲学”。陈寅恪先生也提出搞中国学术既要自觉吸收国外优秀成果，又要不失民族的血脉。这些主张都体现了对当下中国的关怀。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的命题，目的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从端正马克思主义观的高度，提出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要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说，学习外国的东西不应是对理论的消极的适应，尤其不能刻板地照搬，而要根据本国的条件活用其原则，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十五大报告对活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就是以革命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离开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但一定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十个结合”的第一条，是对上述论断的准确概括。如果说，“中国化”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主要理解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这个命题在上个世纪末又被自觉地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研究对象，那么，自从国外学者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概念并被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后，立足于“中国特色”范式来从事理论研究，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学者的自觉选择。

二、“中国特色”范式的时代内涵

提出“中国特色”研究范式，既是近代以来学术史的经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根本的经验之一，就是昭示人们做时代的思考者。说马克思主义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一点与实践的特性有关。生活实践是理论的本体，它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历史水平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超越历史条件，而在于它总是伴随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每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实践的发展都会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提到人们的面前。时代课题是着眼点、立足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在理论和时代的互动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

毛泽东多次指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列宁说的、做的，有许多东西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他号召全党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不能照抄照搬，而要大胆创造。邓小平认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历史条件。马克思去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新的历史条件是马克思和列宁不



可能预见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时代的情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种否认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时代，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他还多次讲过，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正是我们党对时代的新觉醒的产物。

时代是判定阶级、政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试金石。与时代的关系可以区分出不同理论的类型和结局。同样是面对民族危机，有的趋新，有的守旧，都与对历史时代的理解和把握有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能否与时俱进，是对一个政党、一个学者的最大考验。严复是中国引进西学第一人，他宣传进化论，打破了历史循环论；他批判了“中体西用论”，主张中国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他率先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中国不变法则必亡！但到1915年，他却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失败后，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李大钊说，时代不仁，演出新旧，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人们都嫌他太新，可是时代变了，能把他弄旧。章太炎是革命派中勇猛的骁将，早年他倡导“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但后来如鲁迅所言，太炎先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三、“中国特色”范式的民族内涵

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既具有时代性特征，又具有民族性特征。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及其成果更多地具

有时代性和普适性，而哲学社会科学除了包含时代性特征而外，还更多地表现出民族特色。民族的主体性是民族文化历史演变“一以贯之”的中心，离开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文化将失去生机和基础。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是抽象的、先在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建构起来的。所以，时代性和民族性不是二元对立的。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是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重要特征。

能否处理好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决定一种理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命运。任何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特征，但就其传播过程来看，人们往往注意它的时代性和普适性，而忽视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这是本本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冯友兰先生曾写过《别共殊》一文，提出向外国学习要区别共相和殊相，并认为特殊性的东西、民族性的东西是不可学的，也是学不到的；共性的东西是应该学的，也是能学到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对待共性的东西，能否将共性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模仿过来？毛泽东认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打不倒敌人。只有应用于中国实际，创造出新的东西，才是有力的武器。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古、今、中、外法，这四者的关系都直接与民族性有关。在毛泽东那里，“中国化”概念是基于实践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是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一手伸向国外、一手伸向古代的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方法。

“中国特色”范式，不同于近代的“中体西用”模式，后者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学”上分中、西，又以中、西（国别或地域）分体、用，从根本上混淆了思

维与存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实际上，“学”是指基本原理，在科学原理这个层面，中外是一样的。“中国特色”范式也不同于“中国本位”模式。如梁漱溟、叶青、陶希圣都在“中国本位”旗号下强调中国特殊性，他们所讲的“把握特殊性”的方法，是把特殊性绝对化，认为西欧社会发展是符合规律的，但中国演进不符合规律，中国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他们提出中国特殊论，就是把普遍与特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目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漱溟本人到延安后，与毛泽东长谈八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陶希圣是坚持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将，但他的人格却是分裂的，他一方面为蒋介石杜撰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一方面又干着损害民族利益的汉奸勾当。叶青也是把一般和特殊对立起来，他虽然无法否认一般规律，但又认为“一般之中有特殊”，“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企图用强调中国特殊性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以此为资本，登上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宝座。“中国本位”论与满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前后的“保存国粹”论调是一脉相承的，都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

“中国化”和“中国特色”范式的实质之一是结合论。所谓结合论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科学理论与民族特色的结合。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提出“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是辩证法的精髓”。毛泽东讲清了一般与个别、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既批判了绝对的“殊相说”，又批判了抽象的“共相说”。

抽象共相说主张理在事外、理在事先，把普遍性的“理”变为脱离了特殊性的神化了的绝对，成为“全盘西化论”的哲学根据。

四、“中国特色”范式的实践内涵

在研究的道路上并没有一个现成的“中国特色”摆在那里，它也不是能随心所欲、轻而易举地就会建立起来的。从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程来看，“中国特色”范式的确立是一个长时间的探索和积淀的过程，它包括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两个方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史无前例的，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就是研究这一探索过程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实践经验的理性反思。

“中国特色”的另一层内涵是实践特色。马克思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需要就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实践所蕴含的时代诉求。梁启超持有与马克思相类似的想法，他在谈到学术与社会需要的关系时指出：“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他所说的特殊机运，也是指特定历史时代的需要，即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实践所提供的时代机缘。所以，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理论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代的实践特色。

众所周知，实践本身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的普遍性不仅使它有资格成为人们从事认识和理论创



造的基础，而且使它成为人们思维的逻辑和研究方法的发生地。严复曾把逻辑称为“万法之法”，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思维的逻辑正是源于人们历史实践逻辑的格。实践的直接现实性使实践总是具有具体历史性和个别性，并决定人们的认识及其成果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使理论只有不断地回到实践，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实践成为科学认识永远无法舍弃的根基，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其认识过程及其成果的大小，总是受到实践发展程度及其历史性的制约。

实践固有的普遍性与历史性的特点，使人们的认识总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以后，实践又成为认识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统一的基础。实践对认识的双重制约性并不是自明的，近代以来，思想界不断发生关于共性与个性、事实与价值以及文化的中西体用之争，争论各方皆因为脱离或无视历史实践二重性的本质要求而止步于纸上谈兵、各执一端，对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的大业毫无助益。

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克服教条主义、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只有着眼于实践，才能真正解决割裂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的教条主义痼疾。从哲学上看，教条主义思维方法就是本质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方法。本质主义主张本质先于存在，理论先于实际，逻辑推演决定历史关系事实。王夫之把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概括为“有因事以求理，无立一理以限事”。教条主义否定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理在事先、主张用“理”限“事”。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时，总是从抽象的理论和

定义出发，用理论剪裁现实、割裂理论与实践的本原关系。因此，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真正破除虚化现实和虚无历史的教条主义，实现理论与现实、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使理论研究和创新达到既立足于国情、又着眼于时代，既自觉借鉴中外、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学术境界。

研究范式是理论研究的总观念、总开关。“中国化”和“中国特色”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对毛泽东思想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总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也是我们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创造中国学派核心理念。

“哲学观的反思与重构”丛书，正是一批青年学者立足哲学、特别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依照“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研究范式，推动哲学理论创新、创造中国学派的一种积极尝试。尽管这些探索可能尚显稚拙，但我想，任何真诚的努力都是值得鼓励和期待的。

李景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所长)

2008年2月18日

目 录

树立“中国特色”研究范式，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 ——代序言	李景源
导 言	1
第一章 哲学与哲学的价值	5
一、哲学是什么?	5
二、哲学的价值	13
三、哲学的手段价值和目的价值	30
四、哲学价值之实现	50
五、哲学与哲学家	58
第二章 现代哲学的价值论转向	78
一、现代哲学为什么会出现价值论转向?	79
二、价值论转向的学理根据	94
三、价值论转向的意义	99
四、哲学转向之后的价值论研究	115
第三章 作为价值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22
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价值意蕴	122

二、马克思价值哲学的主题	138
三、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历史发展	151
四、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主体性	156
五、马克思价值哲学的当代意义	168
第四章 真理论的价值维度	172
一、关于真理范畴的历史考察	172
二、真理符合论及其困境	179
三、真理实效论剖析	185
四、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	191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	206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及其启示	206
二、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新挑战	215
三、创建新形态的方法论问题	229
四、若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评析	240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构建	252
参考文献	277
后 记	287



跨入新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信息革命的兴起），以及生活实践中一系列深层次的价值问题（如生态危机问题、人口膨胀问题、能源短缺问题、高新科技发展的负效应问题、跨地域性的犯罪问题、以及人的异化、人内心的失衡等问题）的全球突显，文化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和深刻变革已成为一种时代性、世界性的思想文化现象。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处在深刻的文化价值观的转型和重建过程之中。

可是，面对无所不在的与客观性的“事实问题”不同、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另类”的价值难题、价值冲突，面向各具特色的深刻的文化价值观的转型和重建，人们手中握有的仍然是传统的以客观性、有效性、普适性为目标的“科学世界观”或“拟科学”的知识论哲学。照搬或袭用这种科学主义哲学的后果，一方面是哲学的“无能无为”或“力不从心”，在具体的现实问题面前感受到“哲学的贫困”，另一方面，还导致了許多理论或实践方面的困惑、混乱，甚至悖谬。

例如，在“科学世界观”或拟科学的认识论视域中，囿于科学范式的权威，囿于“科学化”的认知视角和研究方式，很难公正或恰当地接受和处理价值问题。在学术界，一些纯粹以人文科学、价值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刻意追求“科学化”、“技术化”潮流，追求某种“纯粹的”、“客观的”学问，就某些“小而又小”的问题进行“多而又多”的分析。他们大多都对传统的实践



价值学者的工作不以为然，对现实社会的各种价值问题不感兴趣，拒绝进行认真的反思和讨论，并轻蔑地对待这种研究的价值，拒绝承认这种研究的意义。这种价值领域的“科学化”、“技术化”倾向，把哲学变成了冰冷的高度专业化的“纯粹”技术分析，既越来越远离大众生活，也不能真正解决实际价值问题。

又如，有些人习惯了“拟科学”或科学认识论的研究思路，对规律、客观、必然、决定等情有独钟，对价值问题涉及到人的目的、利益、需要、情绪、情感、意志等感到无所适从，对价值问题与人的选择、自由、超越性等相关问题感到忧心忡忡；对价值问题呈现出主体性（主观性）、多样性、相对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等更是感到很不自在；因而，他们总是将价值问题的研讨归入“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多元论”、“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范畴之中，希望以简单的粗暴的彻底的否定方式脱离这一“是非之地”；或者以上述标签为借口，拒绝对之加以理性的审慎的系统的探讨。

还有些人虽然承认价值问题或价值论在哲学中应该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囿于既定的“科学化”的学科立场，终究无法协调它同原有的其他理论、结论，以及整个哲学理论体系的关系，从而使之保持逻辑上的完整、自治。目前在哲学体系中，尽管一般价值论已经产生，其研究正在走向深入，但大多只是在认识论框架中为价值论留下一小块地盘，有些甚至干脆因袭传统，将一般价值论消解在诸如伦理学、美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科技社会学等之中。尽管在认识论中为价值论留下一些地盘已经是一个进步（至少它使得认识论更为丰富、更为恰当），但仍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因为这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哲学的人学意味，没有体现出哲学的实践品格，没有体现出哲学正在发生的“价值论转向”的成果和意义。

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囿于传统的“科学世界观”，囿于“拟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许多价值问题的研究更是充满着困惑和混乱，更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混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混淆视听，浑

水摸鱼。

例如，某些社会集团、某些人故意将科学、认识论问题与价值论问题相混淆，将事实、真理与价值相混淆，从而在面对价值问题时，以“客观性”、“普遍性”的真理的化身自居，“以真理的名义”说话、做事。他们在“真理的名义”下，别有用心，将实质上的自己的利益与需要泛化为国家或地区、民族、阶级或阶层、群众、大家、他人的利益和需要，从而冠冕堂皇地将自己的利益、欲望、情感、价值判断等强加于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听到一些西方政客、“代表”、以及腐败分子这样说话：“我这是代表大家……”，“我全是为了大家好”，“我这样做，是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我只关心全人类的利益！”……

其中十分典型的是，在当前所谓“全球伦理”、“普遍价值”的追寻中，有些人在科学主义的惯性导引下，盲目追求如同自然科学、如同“真理”一样的有效性、普适性，人为地抹杀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差异，不同国家、地域的特色，以及不同主体（个人或社会共同体）的个性，人为地追求和设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准则、道德规范。例如，某些西方“强势国家”利用自己超人的经济、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利益装扮成全球利益，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论证为全球的共同信念，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强制输出自己的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念，将单边世界秩序强加于人。

可见，如果沉醉于“科学世界观”的一统天下，混淆认识论问题与价值论问题，混淆客观性的真理与主体性的价值，混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非事实性的实践哲学领域（特别是价值论、伦理学等领域）盲目追求类似自然科学领域的客观性、有效性、普适性，那么，就一定难免出现各种霸权主义、极权主义、“中心主义”和单极主义。这造成的危害和后果是有目共睹的，值得一切善良的人们警惕。

因此，必须超越“科学世界观”，超越“科学化”的“拟科学”认知方式，寻求新的理论视角、运思方式、精神品格。而这正有待于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有待于一种新的哲学——价值哲